**游离的城市“异乡人”**

**摘要：**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饮誉世界的文学家，同样他也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位“特殊”的作家。沈从文一生游走于城市和乡村两个文化圈之间，他孤独地求索，以一个“乡下人”的视角审视着都市文化，同时反思着乡村文化，他对于都市文明没有好感，但乡村也不是他的理想家园。长期以来，学界普遍将沈从文所创造的两个文学世界对立起来，认为其创作是在城市和乡村两个世界的对立中构建而成的。本文将着重探讨沈从文对城市与乡村的复杂态度，进而揭示沈从文的思想变化。

**关键词：**现代文学 沈从文 城市 乡村 思想变化

**Abstract：**

Shen Congwen is a world-renowned writer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He is also a "special" writer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literature. Shen Congwen wandered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cultural circles all his life. He sought solitarily and examined urban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countryman", while reflecting on rural culture. He did not like urban civilization, but the countryside was also not his ideal home. For a long time, the academic circles have generally opposed the two literary worlds created by Shen Congwen, believing that his creation was constructed in the opposition between the urban and rural worlds.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Shen Congwen's complex attitudes towards cities and villages, and then reveal Shen Congwen's ideological changes.

**Key words:**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Shen Congwen cities rural areas ideological change

“城市”自其产生之日起便是一个“乡村”相对存在的名词，城乡差别从古至今一直存在。在城市诞生初期，它更多的是作为政治军事的中心而存在的，行政和防御作用突出。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中国大地上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商业市镇”，城市的商业职能也越加明显，伴随着城市经济发展，城乡间的差异也愈来愈大。随着西方殖民者的入侵，中国被迫开始了现代化进程。在现代化进程中，由于城乡间发展的不平衡，出现了“现代都市”与“乡土中国”二者的对峙与渗透。这种对峙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便是文化的对峙——在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的文明程度较之乡村有着巨大的飞跃。从这个意义上说，由乡村进入城市便不仅仅是地域的转换，更是文化层级的抬升。自二十世纪以来，城市以无尽的感召力吸引着无数“乡下人”踏上进城的路，他们不仅体验着由安静的乡村到喧嚣的城市这一生存空间的变化，更感受着背井离乡的漂泊感。而“外乡人”的身份以及与城市的疏离感也刺激着背井离乡的作家们敏感的神经：作为城市的外来者，他们一方面认同现代文明，渴望融入城市社会；另一方面又承受着漂泊的痛苦，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社会充满着眷恋。因此，自卑与自负，疏离与融入贯穿他们创作的始终，也导致了他们对“现代都市”和“乡土中国”的复杂情感。“京派”文学大师沈从文便是其中一员。

1922年刚满二十岁的沈从文厌倦了辗转于水边，充满诗意但动荡、满是生杀的残酷战场，结束了长达五年的兵士生涯，怀着逃离的心情离开湘西，摆脱旧社会，奔着他心中自由、没有拘束的现代城市——北京。然而现实与理想有着天壤之别，北京“铁青着脸”，让这个从小自负聪明，满腔热血来学习文化，寻找理想的“乡下小伙”彻底傻眼。走出北京火车站，沈从文便受了一个外表淳朴的车夫的骗。面对北京这座都市，突然跨越两个时代的反差感让沈从文难以承受，生活上的困窘、心理上的自卑更加深了他对都市的疏离，但在朋友们的帮助下，逐渐解决了生存与发展的问题之后，他又被北京这个城市一点点接纳。特别是两次回乡的见闻让沈从文对都市文明和乡村文明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渐渐地嗅到了乡村文明中“腐朽堕落”的气味，不再一味地描绘想象中“世外桃源”般的“湘西世界”，转而对乡村文明何去何从进行了深入思索，“希望找到乡村和都市的融合点”。[[1]](#footnote-1)下面笔者将就沈从文笔下乡村与都市的对立与融合作进一步阐释。

一、乡村与都市的对立

笔者认为，沈从文笔下乡村与都市对立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的原因：

（一）湘西文化的边缘化倾向与故土情怀：

沈从文是湘西凤凰县人，那里苗族、汉族、土家族杂居，风光旖旎，风俗多样而富于色彩，为沈从文的创作提供了极大的想象空间。但是凤凰县处于湘西边鄙之地，在地域与文化上与主体汉民族必然存在疏离。二十年来，沈从文的活动范围局限在边远、闭塞的区域内，一些观念已经定型。沈从文的身体中流淌着湘西的血液，因为生活地域的稳定，沈从文也没有“乡下人”的概念。如今，突然间站在现代化的文明城市，被迫承认自己是个“乡下人”，心里产生巨大的失落与茫然可想而知。

凌宇先生在《从边城走向世界》一书中，将沈从文早期，即1928年以前的作品分为两大类:“一是关于自己的乡土——湘西生活的回忆和描摹；二是关于都市生活的见闻与感慨。”[[2]](#footnote-2)早期的作品大部分选取湘西题材，一方面是因为刚迈进城市的沈从文和城市还没有交集，社会阅历和眼界局限于成长二十年的湘西世界，对那里的风土人情、社会文化了然于心，创作起来毫不费力。另一方面，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回忆是一种带有个人情感趋向的选择性行为。对故土的眷恋、“落叶归根”的情怀是中国人世代传承的，正如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所说：“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不爱自己的乡土，然而，世界上也没有哪一个民族像中国的乡村人那样如此酷爱乃至离不开乡土。”中国人对故乡和家园的怀念，自古未曾削减。

在故土情怀的驱使下，沈从文营造的理想化的湘西世界摒弃了乡村世界的灰暗，体验着来自故土的温暖，这种温暖对于城市给予他的冷酷来说是弥足珍贵的，是他在都市永远无法拥有的感觉。在温暖中沈从文暂时忘却了来自城市的痛苦，在对故土回忆中沈从文寻找到了精神上的“理想家园”。

（二）作为“乡下人”的自卑感：

北京对青年沈从文的排斥激发了他心底的自尊，他努力寻找一种能够与这个城市抗衡的优势。沈从文是打算到北京来读书的，但是这座城市的大学对这个上过几年私塾，小学还没有毕业的青年人并不友好，即使他有一腔热血。“参加燕京大学二年制国文班入学考试时，一问三不知，得个零分，连二元入学费也被退回。”[[3]](#footnote-3)最终沈从文只能以旁听生的身份旁听北大的课程。与周围的人相比，这个“乡下人”的确没有任何能够拿来聊以自慰的优势，自卑感时刻萦绕着他。在此同时，沈从文还面临着严重的生计问题。面对这样的生活窘境，沈从文写信向文学前辈们诉说自己的不遭遇，当时蜚声文坛的郁达夫亲自来到沈从文的住所，了解其不幸遭遇后愤然写下了《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信》，在文章中郁达夫对沈从文这样的文学青年给予了极大的同情与爱护。

与金钱问题相伴的，还有“女人”，城市里灯红酒绿的男女生活刺激着这个青年人的感官，而人的自然情欲又得不到宣泄，于在这样矛盾的情况下，他更将自己围困起来，孕育着更强烈的自卑，正如作家自己所说：“内心生出难看的自惭与毫不相饶的自谴。”他在冷酷的城市的压迫下，低到尘埃里。沈从文创作初期的作品，如《棉鞋》、《焕乎先生》、《篁君日记》等等，都可以找到有关此时自卑心理的表述。

在这样的窘境中，沈从文“乡下人”身份与其少数民族血统都被他自己有意地放大了。他自称“乡下人”并在作品中如口头禅般反复强调着这一身份：

“我是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一把尺，一把称，和普通社会总是不合。”[[4]](#footnote-4)

“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5]](#footnote-5)

“我人来到城市五、六十年，始终还是个乡下人，苦苦怀恋我家乡那条沅水和水边的人们。”[[6]](#footnote-6)

真正的乡下人并不以“乡下人”的身份为讳，所以，沈从文口头禅似的反复强调其“乡下人”身份本身就是自卑心理的表现。在湘西，沈家虽然家道中落，但靠积蓄仍然能够过着社会中层的生活；当兵的五年里，他的知识足够应付生活，并可以在军中谋得一份不错的职务，而眼下在北京的挫败感深深刺激着他强烈的自尊心。沈从文反复提及自己的“乡下人”身份既是自卑也是自负。我们可以说，沈从文越是自卑就越能体现出他心底的自负。他要靠乡下人这股子蛮劲闯荡北京，闯入文坛，靠自己的奋斗让这座城市接纳他。

与“乡下人”这一身份相伴而生的是沈从文的“湘西情结”。龙朱曦、陈兴芜在《中国现代浪漫主义小说模式》一书中指出：“沈从文的文学文本中体现的湘西情结是一种作家自卑情结的体现。”[[7]](#footnote-7)“湘西世界”的创造正是源于沈从文在对乡村文明和都市文明的比较中产生的对自我能力的不自信，对自己处境的不满与忧虑，这种心理归根结底还是一种自卑心理。对于沈从文来说，他的“寂寞”便在于他对于现代都市文明没有好感，但同时他又无法忍受乡土社会里的种种劣行，因此他选择了逃离。对于沈从文来说，乡土社会其实并不是他理想的家园，但都市文明更不是可以供他栖息之处。此时的沈从文处于精神上无家可归的状态，面对都市文明对他的“嘲弄”，沈从文的自尊心受到强烈的打击，而“湘西世界”的创造则是掩饰其自卑心理的一种努力。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过滤了野蛮的风俗，残酷的屠杀，堪称“完美世界”的化身，那里人与人之间平等友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宛若“世外桃源”。作家描绘想象中的世界正是基于其对都市文明的厌恶，以及对都市人虚伪、冷漠的认定。因此“湘西世界”正是沈从文的一片“自留地”，是他那颗受伤的心灵栖息的家园。正如何国成先生所说：“他（指沈从文）不得不在都市里讨活，但他的情感、理智、精神、幻想和希望又一直沉溺于乡村世界，在过去的印象中寻找新的理想，慰藉和寄托……”[[8]](#footnote-8)

（三）都市中人们的病态生活：

沈从文与都市格格不入，精神上的孤独、苦闷驱使着他创作了一系列都市批判的作品，表现都市的病态以及对人间温暖的向往。揭露都市病态本身即是对都市文化的不满，对都市的疏离。沈从文以“城市外来者”的旁观视角审视城市世界，发现都市中上层阶级生活的空虚与堕落，于是大加称道乡村世界的人性美、人情美以及道德上的优势，强烈批判都市的病态生活。

早期的作品，大部分是对乡村世界的描写，表现了地处边远、偏僻的湘西世界的动人风情，在这个世界里，甚至强盗和妓女都个性鲜明，不再是遭人谩骂的下等人。《在别一个国度里》山大王铁汉柔情，称得上贤婿佳夫；《柏子》中柏子与妓女之间除了交易之外的深刻的爱恋。《边城》中的妓女，与一般意义上出卖身体，做皮肉生意，没有灵魂的妓女大为不同，她们身上闪烁着人性美、人情美的光辉。与这一美好的湘西世界相对的是一个污浊、虚伪、冷漠的“都市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西服与长衫、新贵与地主、妇女解放与娶姨太太等多种对立共存；在这个世界中充满着腐化与堕落，上流社会的世俗男女逢场作戏，夫妻间相互欺瞒，充满了无意义的交际，令人发指的乱伦……沈从文在《绅士的太太》、《某夫妇》、《来客》、《八骏图》、《或人的家庭》等作品中对上层社会种种丑恶情形如：朋友间敲诈勒索、夫妻间相互欺瞒、教授们口是心非、大学生们浅薄无知、知识分子碌碌无为……做出深刻地剖析与批判。这样，从上到下腐烂堕落的都市社会与淳朴真挚的乡土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四）腐烂的上层生活与苦难的下层生活的不平衡性：

在沈从文都市叙事中，还有一类作品是关于都市下层生活状况的，如《生》中，老头子身无分文，在北京十年来卖力地表演同样的节目，手脚并用、低三下四、看客稀少、巡警摊派，表现了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杂耍艺人的窘困与悲哀，但同时老人的内心满含着一位慈父绵绵不尽的爱，《腐烂》、《泥途》的背景是都市的贫民窟，这里的人在环境恶劣的贫困状态中挣扎着。他们是被都市抛弃的一类人，没有人过问他们的生命，他们提出的保护生命的要求无法得到满足。沈从文通过上下层生活状态的对比，暴露了都市的畸形发展，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失衡的状态。这与《边城》、《长河》中所描写得那种不计金钱，遇事相互帮助的人与人之间美好和谐的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二、乡村与都市的融合

1937年抗战爆发后，沈从文为躲避战乱，随友人南下，1938年回到湘西，此次回乡之行，沈从文感触颇多，目睹湘西种种劣性，沈从文也敏锐地察觉到其中的堕落趋向，他要为衰微的湘西世界开一剂药方，而他为湘西开出的药方便是乡村与都市的融合。

笔者认为，沈从文希望乡村与都市融合有以下两方面原因：

（一）沈从文目睹乡村的落后：

沈从文回乡目睹了每况愈下的乡村世界，感触颇深。那个原本美好的“湘西世界”在他手中也渐渐解体，他看到了他所钟爱的乡村并不是“世外桃源”，其中也存在有令人不齿的一件件肮脏丑恶的事情，正如他在小说《夫妇》中所说：“觉得在这里是厌烦的地方了,地方风景虽美,但乡下人与城里人一样的无味。”乡村的现实敲碎了他美好的“湘西梦”。

（二）沈从文对城市文明的认同与向往：

沈从文凭借着自己“乡下人”的那一股蛮劲闯入了文坛，渐渐地有了自己的名气，当上了大学教授，组建了自己的家庭。此时的沈从文已经慢慢地融入了都市这个文化圈，慢慢地与都市和解了，同样也看到了都市文明的先进之处，慢慢地也向往“城里人”的生活了。虽然沈从文对于都市文明仍有疏离，但至少他对于城市的厌恶感渐渐减少了，对于城市文化的认同感与亲近感渐渐增加了。此时的沈从文度过了城市生活的磨合期，渐渐适应城里的生活，他渐渐被都市文明改造着，因而在衡量乡土社会时候便常常会不自觉地带上城市文明的标尺。面对乡土社会的落后，沈从文希望将城市的进步观念植入乡村人头脑中，把乡村的淳朴民风注入城市人血脉中，达到二者的融合。

沈从文曾说自己要建造一座希腊小庙，庙里面供奉的是“人性”，这“人性”指的是自然、健康、美好的人性，是未受污染的人性。对于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沈从文感到很难皈依其中的任何一种。在沈从文看来，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不全面的，只有将二者融合起来，相互补充，才是他所认为的“出路”才可能完成“民族品德的重造”工作。

因此，透过沈从文的文字，不难发现他其实始终游离在城乡文明之间，他不断对社会问题进行思考，对生命神性进行追寻。这也是说沈从文复杂深邃的原因所在。

1. 姜宁：《乡村和城市之间》（延边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 [↑](#footnote-ref-1)
2. 陵宇：《从边城走向世界》，岳麓书社，2006年。 [↑](#footnote-ref-2)
3. 姜宁：《乡村和城市之间》（延边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 [↑](#footnote-ref-3)
4.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0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第266页。 [↑](#footnote-ref-4)
5. 沈从文：《从文自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20页。 [↑](#footnote-ref-5)
6. 祝注先：《一个杰出的‘乡下人’和他杰出的文学造就》（载《怀化师专学报》1994年1月） [↑](#footnote-ref-6)
7. 龙朱曦、陈兴芜：《中国现代浪漫主义小说模式》，重庆出版社，2002年，第201页。 [↑](#footnote-ref-7)
8. 何国成：《论沈从文的两种跨越》（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年，第257-264） [↑](#footnote-ref-8)